

林徽因“太太的客厅”与文人往事

2025年是古建筑学家、诗人、工艺美术设计师林徽因逝世70周年。1931年至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租住在北平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后改为24号），他们的客厅被外界称为“太太的客厅”，是那个年代北平最著名的文化沙龙之一。

学界友人的精神家园

1931年10月，梁思成和林徽因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寓居于靠近东皇城根的北总布胡同3号。这是一座老北京典型的两进小四合院，整体宽敞明亮，典雅幽静。

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这样描述当年的温馨之家：“我记得，妈妈常拉着我的手，在北面的院子中踱步，院里有两棵高大的马缨花树和开白色或紫色小花的几棵丁香树”，“妈妈喜欢在客厅西北角的窗前书桌上静静地写作”，“客厅的窗户朝南，窗台不高，有中式窗棂的玻璃窗，冬天的太阳可以照射到屋里很深的地方，妈妈喜爱的窗前梅花、泥塑的小动物、沙发和墙上的字画，都沐浴在阳光中……”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客厅比其他的房间要大，坐北朝南，兼作书房，布置幽雅，是他们生活、读书、会客的重要场所。北墙正中悬挂着一幅蒙娜丽莎的画像，两边是梁启超手书的魏碑体对联“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靠南窗的位置，放了一组柔软舒适的沙发，茶几上摆设一个花瓶，里面插着时令鲜花，传递出女主人的浪漫情怀。窗框的下层已然换成玻璃，视线通透，不仅可以直视窗外的景色，隆冬时更能



1934年，金岳霖、费慰梅、林徽因、费正清、梁思成（从左至右）在北总布胡同梁、林家中客厅。

接纳一片温暖的阳光。窗框的顶端悬着一卷纸帘，晚上轻轻垂下，室内外顿时成为两个天地。

20世纪30年代，国内时局动荡，然而，林徽因以她的学识、智慧和富于个性的审美情趣，将自家的客厅营造成学界友人的精神家园，为她和她的朋友们创设了充满张力的文化空间。

情系一生的异国知音

1932年初，酷爱中国文化的美国青年费正清为完成自己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中美贸易关系发展史》，与女友——时任哈佛大学校长坎南博士的女儿费慰梅一起赴华游学。

这年秋，他们在北平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在北平美术俱乐部外国人举办的画展上，邂逅了同在参观展览的梁思成和林徽因。

费氏夫妇很快成了梁、林家的座上宾，尤其是费慰梅，黄昏时，喜欢一个人独自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去找林徽因喝茶聊天。费慰梅在回忆录中说：“在客厅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

热茶，我们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讲出来。我们有时分析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就转向彼此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谈谈对方不认识的朋友。”通过梁、林、费氏夫妇还结识了执教于清华、北大、燕大的一些知名教授，他们给这对异国夫妇提供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在那间客厅里，费正清、费慰梅不仅领略了林徽因朗诵中国古典诗词时抑扬顿挫的神韵和魅力，而且多次聆听到她品析中国古代诗歌同英国济慈、丁尼生和美国维切尔·林赛作品的异同。林徽因对这份跨国友谊同样珍视有加，她在与他们分别后写的第一封信中（1935年圣诞节之后）倾诉说：“在你们俩真正在（北总布胡同）3号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我总是觉得若有所失，缺了点什么，有一种精神上的贫乏需要营养，而你们的‘蓝色书信’充分地补足了这一点。”

随着梁思成、林徽因社交圈子的日益扩大，北总布胡同3号一度成为京派文人聚会的主要场所之一。到这里聚会的不乏北平知识界的学者、教授、作家，尽管他们专业不同，但丝毫不影响彼此在真挚友谊下的精神对话。

每次聚会，林徽因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和核心。她于文学、建筑学、艺术皆有精深造诣，其广博的知识、机智幽默的谈吐、激情四射的活力，给每一位参与者都留下了难忘印象，诚如费正清所言：“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在围绕着她转。”

萧乾眼中的林徽因

1933年9月，还是燕大学生的萧乾，经恩师沈从文之手，在其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蚕》，林徽因读后很是激赏，主动联系沈从文，让他请萧乾到家中做客。

11月初的星期六下午，萧乾在沈从文的带领下，羞怯怯地跨进北总布胡同“太太的客厅”。萧乾先前听说林徽因患有严重肺病，可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却发现她根本不像个病人。

那天，林徽因穿了一套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费慰梅去郊外骑马），对萧乾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一下子让萧乾拘谨的神态和窘促的心理烟消云散，以致半个多世纪后，萧乾对自己与林徽因首次见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她比一个健康人精力还旺盛，还健谈”，“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

1935年7月，萧乾被天津《大公报》聘用，他常造访“太太的客厅”，听取林徽因的编稿意见，并向她及其他名家约稿，不久，萧乾在文学界声名鹊起。1936年，林徽因又鼎力支持萧乾举办法的活动，亲自从“文艺副刊”已刊作品中选出30篇小说，汇编为《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梁思成、林徽因愤而南迁，曾经备受关注的“太太的客厅”，成为人们绵绵的回忆。

据《北京晚报》周惠斌/文

忆母亲沈安娜从“龙潭”脱险

沈安娜是中共杰出的秘密情报员，她奉命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担任机要速记员多年，为我党搜集了很多重要情报，她的丈夫华明之在另一掩护机关工作，从旁指导、协助、掩护，他们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夫妻情报组。两人的女儿华克放回忆了母亲从“龙潭”脱险惊心动魄的过程。

1949年，早春二月的一个夜晚，我们一家住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对面的中南旅社，突然响起了敲门声，熟悉的男声轻声喊：“大哥大嫂，我来了！”开门后，我和哥哥、弟弟高兴得大喊：“六爷叔来了！”

“六爷叔”就是华藻，当时30岁不到，可长得老成。他是上级领导吴克坚特派的一对一专职秘密交通员。

这天晚上，华藻向我父母郑重地传达了吴克坚同志的指示：“大军即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上级党组织指令，沈安娜与华明之不要随国民党反动政府机关南迁，相机撤回上海。党组织要留下一批老党员、老骨干，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和保卫工作。”这样的好消息，让潜伏敌营14年的父母心里燃起了一团火，兴奋了好几天。最后父母决定，由父亲带老人和孩子适时先期撤回上海。母亲则继续留在南京，获取胜利前最后的情报。

此后，母亲独自在“龙潭”崩溃的前夜，继续担任国民党在南京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最后几次“中常会”的速记员，获取了蒋介石拟与中共和谈及打算下野等重要内幕情报。有一

次，等不及六弟华藻来南京家中取，母亲独自拎着藏有密写情报速记本的小皮箱，胸前挂着“中央党部”的徽章，大模大样地坐火车回到上海老北门旧仓街永安坊2号的华家。母亲顾不上与早已到家的父亲和我们亲热一下，便把自己关在二楼亭子间，迅速将速记符号整编成汉字情报。等在亭子间外的华藻，随即当着母亲的面把情报伪装密藏好，到吴克坚指定的地点进行交接。之后，这些情报通过一个个秘密环节，送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的中央情报部。

此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已是大厦既倾，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命令机要处把重要文件档案分类处理、包装南运。母亲后来告诉我，她趁机又“捞了一把”，仍用无人能懂的自创速联符号，记录了不少有用的东西。这时，陈立夫点名下令机要处的几名人员必须随他们南逃广州，名单中自然有速记“快手”沈琬（沈安娜当时用名）。母亲将刻有“沈琬”姓名的常用印章，还有公婆送给她的结婚金戒指，交给机要处长保存，并说：“我得回上海一趟，去去就回。”机要处长也心知肚明，随口说：“快去快回吧！”无奈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了母亲一马。谁会那么傻，还会回来呢？母亲就这样“金蝉脱壳”了。

大军渡江解放南京前夕，在浓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中，母亲安然撤出敌营，回到了上海。

据《百年潮》华克放/文